甲午战争时期主战舆论三题

黄兴涛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ature of pro－war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95, addressing mainly the following three issues. First, it explains the basic approach and attitudes of this public opinion by analyz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 war, contrasting the actual strength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nd discussing the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so－called "lasting resistance." Second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weaknesses of this public opinion, including megalomania, pursing their struggle only on paper, and propagandizing conservative ideas. Finally, it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public opinion and the rise of reform thinking in 1898, demonstrating that the former laid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latter.

所谓舆论，是"再现社会集合意识并对社会某一事态有影响力的多数人的倾向性意见。"①甲午战争时期，"主战"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倾向性意见。对于此种舆论，目前学术界尚有不同评价和有所忽视的方面，存在着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因此，本文拟就此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甲午"主战"取向还是应基本肯定

关于甲午"主战"的舆论取向是否正确、应否肯定一事，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构成问题。人们曾习惯于毫不犹豫地赞颂"主战"。而不必去管主战者"主战"的具体内容如何。然而近十年来，有论者在深化研究的过程中，却直接间接、或隐或显地提出了相反的，近乎总体否定的观点。他们从中国落后于日本的前提出发，认为中国的"主战"一开始就是盲目虚骄、轻率错误的；主战舆论也并没有提出什么可取的战略战术意见，简直梦话连篇，不值一顾；甚至认为"主和"既出于无奈、也不失明智，等等。从而使这一问题变得复杂和模糊了。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等和评价甲午战争时期的主战取向呢？我以为要得出公正合理的结论，关键还在于对这场战争的背景、中日双方的实力有真切的了解和认识，而不应满足于"落后必败"的简单命题进行推论，或停留在主战舆论的表面，为某些荒唐可笑的具体主战意见遮住视野。如果真正做到这一点，就会发现，"主战"这一舆论的基本取向其实并未错。那种总体否定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为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加以证实。

首先，从战争背景及发展形势来看，当时的中国实不得不战。这由战争的主要起因即日本的蓄意挑衅所决定，并不以中国单方面的意志为转移。

事实上，战前的清政府和李鸿章尽管对日本的实力估计不足，甚至存有轻敌之念，但总的说来却并不想与日开战。而日本则相反。正如当时主战舆论所揭示的那样："倭人谋我，规画有年，观其用兵，概不出八年前倭臣所议"，②用李鸿章的话说，即"倭之蓄谋与中国为难已非一日"。③另外，在同中国交涉朝鲜问题的过程中，日本又进一步窥探了清王朝的虚实，从而下定决心，不惜代价要与中国决一死战，以为非如此不能赢得东亚霸权，且良机不可错失。因此，他们精心设局，一味挑衅，寻找和制造种种借口，步步紧逼，并不给清政府留下避免战争的机会。④

在这种情形之下，清政府实际上已经无法回避战争。既然如此，那么它唯一正确的选择，便应该是积极战备、一意主战并战斗到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为战局创造有利的条件。否则，就只能贻误战机，使自己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

通观甲午战争时期清王朝每一次与日"议和"，其结果无不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以开战之前和开战之初而论，由于清朝最高统治者和李鸿章看不清日本志在必战的形势，特别是李鸿章"和"字当头，消极备战，一味仰赖他国调停以促"和"局，结果痛失先机，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赫德曾敏锐地指出："外交把中国骗苦了，因为信赖调停，未派军队入朝鲜，使日本一起手就占了便宜。"⑤这是完全正确的和令人痛心的。1894 年 7、8 月间，国内主战舆论的最初勃兴，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此而起。黄海海战失利后，清王朝在一面与日作战的同时，又一面"求和"，其后果也是如此。正如当时主战舆论所普遍谴责的那样，由于低估了日本的欲望，"求和"不仅徒劳无益，反而骄纵了敌人，束缚了自我，影响了战备，疏泄了士气。只是因为主战舆论再次勃兴及其督责，才使其危害得到了一定的消减。

由此可见，"主战"与"主和"在日本蓄意挑衅、志在必战的背景下，仅从战争本身来考虑，前者也显然要较为明智，更不用说从情理上讲，面对丧权辱国的威胁，中国不得不奋起一搏了。

其次，从实力对比和国际局势来看，当时的中国也并非完全不可与日本一战。后来败得那么惨直至签定《马关条约》，并不是绝对象梁启超等人曾认为的那样，是战前就注定了的必然结局。⑥

人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不错的。但并非落后就只能挨打、不应也不必尽力抗争、完全没有胜利的希望。同时，对于"落后"或者"优势，""强"或者"弱"，还不能笼统言之，而应具体分析。诚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国力大大增强，特别是军事力量。其在军制、武器、军队纪律诸方面总体说来都强于中国。但同时，它也有许多不利的因素，如作为岛国，它地小人少，物质基础本不厚，又借有大量的外债；其全国兵额不满二十万，数量上远不如中国；再加上劳师袭远、补给困难；挑衅侵略，理上为曲，等等。凡此种种，在历经持久的战争后，都会对其最终结局产生程度不同的消极影响，直至毁灭自身。

不仅如此，即便以武器装备而论，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日本的优势也不是绝对大幅度的。换言之，中国也有长物。在海军方面，除了众所周知的曾令敌胆寒之"坚船重炮"外，中国海军还拥有日本不曾有的先进鱼雷艇；在陆军方面，北洋陆军装备有德制的毛瑟步枪和克虏伯野炮，有日本学者便认为"比使用村田式步枪的日军优越"。⑦

另外，还可以战争事实而论。黄海海战虽以失败告终，却给了日本海军以重创；海城陆战，双方激烈的争夺战持续了两个多月，连日军统帅山县也承认，那是"排千难冒万险而攻陷的"，

日本史书因之称其为“海城苦战”;⑧至于台湾抗战,则是更为有力的例证。它是在清政府不予支持,不准援助的情况下进行的。此次,日本出动了五万精兵(超过了此前用兵的总兵力),战死了近卫师团长、旅团长及以下官兵五千人,才最终得以占领它。而台湾抗战,竟坚持了四个多月,相当于此前清政府与日对抗总时间的一半。以上种种,都在在表明,当时的中国并非不可与日本一战和没有最终胜利的可能。

有论者喜欢将甲午时期的“主战”与义和团时期清廷的“主战”,相提并论,等而视之,其实这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后者是慈禧和端王等极少数最高统治者愚陋顽固的集中体现。它虽然也有着列强欺压的背景和民族反抗的动机,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激于私欲、流于情绪化的结果。其不自量力地主张同时与八国开战,简直荒唐得如同儿戏。这样的“主战”,当然毫不足取。事实上,正因为如此,它一开始就遭到来自广大地方官员的联合抵制,在朝廷内部,也受到许景澄等通晓外洋情形官员的公开反对和批评。而甲午战争时期的“主战”则不同,它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和广泛性,是统治阶级比较理智和严肃的抉择。除了前面已谈及的“不得不战”的战争背景和“可以一战”的实力条件外,它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也显然有别于前者。此时的中国只同日本一国开战,欧美列强虽不无偏向和野心,但由于彼此矛盾的利害关系,互相牵制着,基本上不构成中国对日作战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交得法,中国完全可以不太顾忌地放胆单独与日本战斗到底。

当然,我们说中国可以同日本一战,只是就客观条件而言。在“可战”与“最终战胜”之间,还存在一个“善战”的环节。这就涉及到主战舆论中有关“如何战”内容的认识问题。

第三,从战略战术角度来看,当时中国要想打败日本,也并非无计可施,而是可以有所作为。此期的主战舆论中,就提出了不少有益获胜的建议、和具有重要价值的方策,并非象有些否定主战论的学者所认为和强调的那样全是梦话,毫无可采之处。

在甲午主战舆论中,“持久”战总体战略的提出及其论证,无疑是最具价值和值得重视的意见。目前学术界对此战略意见在甲午战争时期的形成发展,似尚缺乏深入的论述,对其在当时的战略意义也估计不足,这恐怕是影响到人们不太重视主战舆论的原因之一。

大体说来,此期“持久”战的战略主张,始出于开战不久的 1894 年 7 月底 8 月初。到 8 月下旬时,已经有了较为成形的论说。如御史张仲炘在 8 月 18 日的奏折中,就颇有见地地分析指出;日本蓄意侵华,战备充分,兵船既比我多,器械也比我利,加上此次又“挟全力而来,其锋甚锐”,故一时得手不足为怪,也不足为惧。日本地小兵少,经费不敷,能速胜却不能持久。因此他强调,中国不能指望速胜,而“须与之久于相持,耐心坚忍,胜固可喜,败亦勿忧”,直至坚持到最后。最令他担心的,就是当权者经不起失败,急于苟安求和。他认为,“以中华之全力”与日本相抗,且“一意持久”,必能赢得最终胜利。⑨

这种主战的“持久”战战略,随着战局的日益恶化,逐渐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特别是到了马关议和前后,它几乎成为有识的主战者们的共识。如刘坤一就明白强调:“‘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⑩严复也认为:“为今日之计,议不旋踵,十年二十年转战,以任拼与贼倭没尽而已。诚如是,中倭二者,孰先亡焉,孰后倦焉,必有能辨之者”。⑪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并指出,“持久”抗战,对于日本来说必是它日益衰落和窘困的过程,而对于中国来说,则将成为一个“徐除其弊”,不断自强的过程,正所谓“兵虽乌合,战则可以日精;将虽愚怯,战则日来智勇;器虽苦窳,战则日出精良”。⑫

不仅如此,马关议和前后,主战者还进一步提出了“迁都”的正确主张,作为“持久”战的前

提和首策，一方面，借以破毁日本威胁都城，逼迫朝廷投降的企图；另一方面也利于将士放胆拼战。同时，逼迫日军深入内地，陷入困境，从而围而歼之。

上述“持久”战战略决策，尽管存在着许多不成熟的地方，比如还缺乏更为具体明确的战略步骤等，但基本上还不失为正确可行的策略，是符合当时中日战情的明智之论。实际上，它所指明的，也是当时所能打败日本的唯一可能的途径。以后的中国抗日战争，正是依靠更为成熟的“持久战”战略，来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就战略思想的发展而言，甲午战时的“持久”战论，无疑具有着开创之功。

除了总体战略之外，甲午“主战”舆论还奉献出不少智慧的战术意见。如曾广钧为海军战术而提出的建议，就是其中一例。曾氏还在中日海战正式爆发之前的 7 月 20 日，就在主战奏书中指出，海军千万不可消极防守，以免日舰“袭孤拔之故智”，应当主动出击，“先下辣手，力戒马江复辙。”⑬可惜李鸿章对此充耳不闻，后来一味“避战保船”，终致北洋全军覆没。

甲午战争时期，主战舆论还在大胆揭露朝廷军备废弛、用人不当、官吏腐败贪污、将领畏葸无能等各种腐败情形的同时，及时而严肃地提出了积极布防，严惩逃将贪吏，选用能帅，根除奸细、速筹军需等具体的应急之策，这些言谈诚然无甚高论，不宜拔高，但在当时还不失为有效的“治标”办法，对鼓舞士气也起到积极作用。

总而言之，甲午“主战”舆论取向，就实质而言乃是一种基本正确的对日态度和社会意见，应充分肯定其历史地位。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甲午惨败正是清王朝未能坚持“主战”、特别是未能采纳“主战”论正确意见的结果，是“主和”论最终支配的产物。

二、主战舆论的缺失和阴暗面

我们说甲午“主战”舆论的基本取向是正确的、应予肯定，并不意味着认为这一舆论本身已十分完满。事实上，只要大略翻检一下这一时期的各种主战论资料，就会发现其缺失恰是十分突出，显而易见的。

甲午“主战”舆论明显的缺失之一，是虚骄之气不同程度地贯穿始终。特别是主战舆论初起之时、这种虚骄之气还颇为浓重。其实质表现，是不能正确地认识自我，过高地估计自己而低估日本的实力。开战前夕及战初存在的“速胜论”，便是这一缺失的典型体现。当时，人们纷纷陈奏什么“倭兵虽练，未经大敌，不难一鼓得手”。⑭日本“弹丸小国”，“外强中干”，竟胆敢不逊，“想天戈所指，不难指日荡平”。⑮即使是有些谈“持久”战的人，也认为日本财力军力不足以相持一年或几月，实与“速战”速胜论无异。正如李鸿章所言：“方倭事初起，中外论者皆轻视东洋小国，以为不足深忧”。⑯英人赫德当时也说：“现在中国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之外，其余百分之九十九人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败小日本”。⑰赫德的说法恐有夸大，但却大体反映了当时国人盲目自大、轻视日本的社会虚骄心理。

建立在上述虚骄心理基础上的“主战”论，当然不可能是很健全的。它与真正全面了解对手之后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其结果，必然导致“战术上轻视敌人”的错误。

严复在《原强续篇》中，曾对当时主战舆论中的虚骄表现有过生动的揭示，他指出：

“不审彼已之情实，不图事势之始终，徒扬臂奋呼，快一发而不虑其所以为收。迨至事功违反，同共咤骇荡。众难群疑曰：‘是必有强国焉阴助之耳，不然倭乌能如是！’又曰：‘是必吾国有枭杰焉为之谋主，不然倭又乌能如是！’又曰：‘是必我之居津要者与表里为奸，不然倭又乌以至

此！’嗟乎！诸君自视太高、视人太浅、虚骄之气不除，虽百思未能得其理也。夫所恶于虚骄恃气者，以其果敢而窒，如醉人之勇，俟其既醒，必怯懦而不可复作也。”⑱

的确，在虚骄和怯懦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本是一对孪生兄弟。这一点，我们从光绪皇帝身上可见一斑。他先是虚骄地表示“一意主战”，后来在日本威逼都城时，又惊慌失措，不敢坚持再战，直至接受屈辱的《马关条约》。历史证明，依恃虚骄之气“主战”，是绝不可能经受住严酷的战争失败、而顽强地“持久”抗战到底的。

甲午“主战”舆论的第二个明显缺失，是书生意气、纸上谈兵的现象一直严重存在。

甲午“主战”舆论的主体，包括上至帝王、枢臣、地方督抚，御史台谏等言官，下至各地士大夫等各阶层人士。其中，“言官”广泛上书尚不足怪，而那些本无“言责”，只能请督察院代奏的举子们大量上书或刊布言论，却成为此期“主战”舆论的一大引人注目的特征。然而，言官和举子们虽爱国之情可掬，动机可嘉，但由于多不知兵、所论往往流于纸上空谈、无济于事。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出奇兵直捣日本”说和“联合他国对付日本”说等。由于其荒唐之处研究者已多有论及，在此毋需赘言。

除此之外，甲午主战舆论还存在着不了解战事进展的实情、闻风上书和作论的现象，特别是在广大举人和部分京卿的言论中，此种现象还有一定的普遍性。这一方面固然是舆论现象难以避免的弱点，另一方面，也与当时中国交通避塞，信息不灵的社会现实紧密相关。其结果，是使其不少言谈成为无的之论，不仅无益于战争，反而制造了混乱。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的不少主战者还乐于制造和传播有关李鸿章父子的谣言，为“主战”服务。如指责李鸿章父子为日本在中国的内奸，在“议和”中，李鸿章“一任其子李经芳指使倭人百端需索。甚且倭人所不愿者亦为之要求，丧心昧良，倒行至此！”⑲或说：“淮军之不战，李经芳实使之。李经芳之接济倭奴军火，李鸿章亦讳之。而倭奴乃敢昌言无忌，有取京师立李经芳为帝、依张邦昌、刘豫故事等语。”⑳这些谣言，虽给李鸿章父子的误国“求和”造成一定的社会压力，但谣言终归是谣言，而且这些谣言还明显经不起推敲和检验，它不仅使“主战”论者减弱了一份庄重，使当权者增加了一份“主战”及主战者的靠不住感，还容易造成李鸿章父子及其同党的逆反心理，从而在妥协求和的道路上愈走愈远。

最后，我们还想专门谈谈甲午“主战”舆论中的阴暗面，即顽固思潮借“主战”之由，乘机抬头的情形。

此一时期，打着“主战”旗号，慷慨激昂地反对学习西方，否定洋务运动，泛起顽固落后尘渣的现象，可谓引人注目。如编修王荣商就认为，备战首先应“罢铁路以塞漏巵”。㉑四川举人罗智杰等也主张，备战筹款首先应取消机器、兵船、火车、电线等，认为“无益之用莫甚于机器，而机器之无用莫甚于兵船、莫可恶于火车。”“电线徒妄传师旅之耗，鱼雷徒足碍平行之舟。至造器织布，则又尽夺百工业而绝女红食。凡此诸弊端，皆岁耗国帑千百巨万，一旦概得停止，较之开指税屋所入为多，以资灭倭而有余，尚何用之不足，何饷之不继？”㉒军帖式汇瀛也认为，电报“有弊无利，有损无益”，奏请“将各省所设之电线统行裁撤，以绝弊端。”㉓主事裕绂则更进一步，“拟请嗣后凡讲求西法之事，一切作为罢论”。㉔

湖南平江人张璵，是甲午战争时期舆论界颇为活跃的主战派人士。他当时曾作《洋祸论》一文，流传很广。该文认为创自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说法荒谬不足信，抨击洋务运动以来的各项“师夷”举措未收毫发之效，徒以资敌。他主张“以拙制巧”，操“我长龙舢板等师船，红衣劈山等火炮”这类旧式武器，与日本等列强交战，反而比用“师夷”之技效果更好。他痛惜“洋

祸"远不见尽头，哀叹通商口岸"吾民愈与之近，则愈变而愈不知其初，至于伐性伤生、糜烂血肉之具与夫奇技淫巧惊听骇视之端，来自外洋者，岁新月异，未知何底？"然而，他虽憎恶西法，忧患"洋祸"，却又找不出避免之方，只是一味地哀愤、抱怨以前万不该开了海禁，"向使海禁不开，则鸦片不至流毒中国，道光之衅亦何由生？始事不慎，康熙诸臣实当之。黩武而不能武，剥丧元气，钩致戎心，乾隆诸臣实当之。而祸水横流，则又滥觞于朱棣也。"㉕

概而言之，这些主战派们"主战"的目的，是想在打败日本之后，一举闭关，根除"洋祸"，再次回到以往那纯粹自给自足，与世隔绝的平静岁月；而"主战"的主要手段，则是靠废除已行"西法"，停止"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完全仰赖中国传统的一套。

象这种以爱国姿态出现的顽固保守的"主战"论调，当然无益于中国的对日战争，更有害于民族的前程，纯属历史的倒退和反动。然而，在当时的社会里，它却还有一定市场，是一种值得反思的历史现象。它表明，洋务运动尽管在朝廷的主持下进行了几十年，不仅实际成绩不大，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未能取得彻底胜利。反过来，它也说明了传统思想在近代的根深蒂固、和学习西方、变革社会的艰难。

以上，我们谈到了甲午"主战舆论"中的一些缺失及阴暗面、可能还不止这些。但仅此已可见，那种认为"主战"舆论"梦话连篇"的否定观，并非毫无根据。事实上，我们只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对此期的"主战"舆论有更为全面公正的评价。但是，"缺失"又毕竟只是"主战"舆论的一面，以它既不足以否定"主战"取向的正确，同时，也不能因此掩盖"主战"舆论的那些积极内容和正面效应。

三、主战舆论的积极效应与戊戌维新思潮的兴起

现在人们谈起甲午战争对戊戌维新思潮的影响时，一般都没有提到此期"主战"舆论的作用。实际上，"主战"舆论与戊戌维新思潮之间，却有着不容忽视的内在联系。概括地说，前者为后者的兴起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并作了某些思想准备。具体地讲，这种联系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其一，甲午"主战"舆论，始终贯穿着雄浑的爱国主义旋律，成为近代爱国浪潮的一次空前激荡，为戊戌维新思潮的兴起传导了一般强大的精神动力。

在甲午"主战"舆论中，不论是对日寇侵略的谴责，还是对清朝各种腐败的揭露；也不论是对主和派屈辱求和的痛诋，还是关于民族危机的呐喊，都充溢着浓烈而深厚的爱国之情。翻检和阅读这些饱含真情的言论，令人深切感到，当时中华民族由此焕发出不甘沉沦的民族精神与未曾泯灭的内在活力，而这，正是我们民族在历经这次劫难后猛然觉醒、不曾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统治的真正根源。

与这一时期的"主战"舆论相比，"主和"论虽然有的也不乏爱国之思（如《忘山庐日记》的作者孙宝瑄的上书），或也主张战后必须力行改革，但总的说来，它们似缺乏真挚雄浑的爱国热情，缺乏为民族的当下命运与未来前途深怀痛楚的忧患意识。较多的只是出于对满清朝廷现有统治秩序的维护和自身既得利益的关心。从表面上看，它们仿佛较为冷静和理智，其实这毋宁说是一种麻木不仁，是一种大是大非不分的昏庸。其后果自然是误国害国。

诚然，同此前一样，甲午战争时期"主战"舆论所蕴含的爱国主义，总体说来仍未突破忠君爱国的传统窠臼。但在后期，由于民族危机的严重和巨大羞耻感与愤怒情绪的推动，人们心中

的爱国意识明显压倒了忠君意识。且不提弥漫于下层社会心理中谴责君上的隐性舆论，即在此期公开上奏的文书中，那种为了民族命运而直批龙麟的言词也屡见不鲜。如张之洞和易实甫的"主战"奏折中，就反复出现"皇太后皇上畏倭之心"这种"大不敬"之语。御史安维峻竟不避斧钺，奏请慈禧太后不要揽权"主和"，以免贻害国家，应放权于光绪、抗战到底；有人针对昏君控制议和消息、不接受天下公论的独裁误国行径，敢于大胆发出"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的怨责之声，㉖更有甚者，搬来生疏的《万国公法》，摘出其中"持权无限之君，虽曰惟所欲为，实则只可以其权保国、而不可以之丧国，若立约以丧国，其约即可废"，以及"割地让城，必须全民公议"的条款，来反对卖国条约的签定和批准。㉗至于此期出现的，从反省战争失败原因角度来直接揭露和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较为深刻的思想言论，则更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历史是连贯的。正是甲午"主战"舆论所传导的这种爱国主义激流，在战后瓜分狂潮兴起的时代背景下更加汹涌澎湃，奔腾不止，直接成为戊戌维新思潮和运动昂然而起的内在精神动力和源泉。

其二，甲午"主战"舆论广泛而深切地揭露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种种腐败情形，特别是时至马关"议和"前后，它又通过对"议和"之后中国悲惨前景的预示，极大地渲染了一种浓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危机感，从而制造了必须改弦更张、且这种更张已刻不容缓的社会紧迫氛围与舆论导向。此后的戊戌维新思潮便是沿此社会心理基向蔚然而兴。

在甲午战争时期，"主战"舆论对中国腐败现状的揭露范围很广。此点，我们从《公车上书》的下段文字中可见一斑。该书写道，当时的中国：

"官制则冗散漫数，甚且鬻及监司，教之无本，选之无择，故营私交贿，欺饰成风，而少忠信之吏。学校则教及词章诗字，寡能讲求圣道，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故空疏愚陋，谬种相传，而少才智之人。兵则绿营老弱，而募勇皆乌合之徒。农则地利未开，而工商无制造之业。其他凡百积弊，难以遍举。"㉘

实际上，不仅当时社会所暴露的腐败现象不胜枚举，即使甲午"主战"舆论所揭露的腐败情形也多不胜述。除了上述所提及的之外，其他比较重要的，还包括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弊害，科举制度的腐败尤其是八股时文的罪恶，军制军器的落后陈旧，汉学宋学的繁琐空疏无用，等等。

以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弊害论，当时的"主战"舆论主要揭露和抨击了以下三点：一是在此制度下，封建君主"窃国"害民，造成了国民素质低下和国家的贫弱。论者指出："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蝟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㉙此论实开了戊戌时谭嗣同痛责君主专制罪恶，斥"君主"为"大盗"论的先河；二是在此种制度下，封建君主"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率由旧章，不知变革进取；拱手无为，一味守成苟安。这种情形一旦进入"列强并争的现时代"，便只能落得被动挨打，坐而垂毙的困境。"言率由而外变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无为而诸国交争，必至四分五裂；"㉚三是此种制度在中国形成了上下尊卑、阻隔难通之势。以致在上者孤陋寡闻，一意孤行，"名虽尊矣，则独立于上，遂致有割地弃民之举"；㉛在下者则奴为主务，难尽心力，无法与民主政体下的西方和日本相抗衡。因为在西洋，人民是"国家之主"，王侯将相为"通国公仆"。而在中国，人民与国家，都是君王的私有财产。"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㉜此种看法虽不尽确切，但在当时能有此种胆识，无疑是令人钦佩的。

尤为可贵的是，甲午主战舆论不仅揭露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腐败，还透过甲午战争的失败，看到并预示了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他们纷纷痛陈：中国当时已是“强邻环伺，虎视鹰瞵”，“精华已竭，膏血俱尽”，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以赔款论，“彼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款未清，后款又来”。㉝以割地论，“则彼知中国势绌，岂肯使倭人独擅其利？群为效尤之请，咸思无厌之求，瓜剖豆分，蝟集蜂起，祸在目前，不待智者而后知也”。㉞

面对着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主战者们开始严肃地思考救亡图存的道路，并由此发出一声声血泪交迸的变革自强呐喊。他们纷纷呼吁：“方今当数十国之觊觎，值四千年之变局，盛暑已至而不释重裘，病症已变而犹用旧方，未有不暍死而重危者也”。㉟

“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㊱

“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不及。”㊲

这一陈紧似一阵的变法呼声，震聋发聩。它与甲午惨败的严峻现实一道，开始惊醒着沉睡已久的古老中华，有力地呼唤并导引着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思潮和运动的来临。此后，戊戌维新思潮的涌起，与此种舆论所初定的社会心理取向是分不开的。

其三，甲午战争后期的“主战”舆论，提出了不少变法自强主张，为不久以后勃发的维新思潮，作了初步的思想准备。

从时间上来看，甲午“主战”舆论提出“自强”或“变法”主张，主要是在马关议约前后。它们不完全是针对当时的中日战局而发，同时也是为了挽救由此而更加激化的民族危机。

就主体构成及其思想特点而言，这些主张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虽强调“自强”，但却反对变法和学习西方，认为只需切实整顿“旧法”即可，这一类同前文提到过的“主战”舆论的阴暗面密切相关，保守顽固，实不足论；第二类主要是一些开明的洋务派人士的论点。可以张之洞等人为代表。他们呼吁“力挽危局”，加快学西学的步伐，扩大采西法的范围，但不太愿意触动传统的旧体制，基本上是“中体西用”论在新形势下的发展；第三类已敢于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及其有关的意识形态部分，即，在“破旧”方面较第二类要大胆深刻，在学习西方的“立新”方面也走得较远。这一类可以严复，康有为等为代表。他们称得上是当时的激进派，代表着时代的潮流与发展方向。

下面，我们便依据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对上述第三类思想主张作一简要论述，以观其与戊戌维新思潮的相互关联。

在甲午战争后期的“主战”舆论中，无论是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开明洋务派，还是以严复、康有为为代表的激进派，他们都清楚地看到此前洋务运动只重视引进西方“器技”的不足，从而强调西方学术和教育在富强中的作用，不过，激进派的思想主张又有自己的特点。他们认为中国的“旧法”已普遍腐败，必须全面改用“西法”，而要改行“西法”，则必须首重西学及“西学”教育。他们批评此前的洋务运动只重“器技”特别是兵器的狭隘无识，认为其并非真正“师行西法”，而是“盗西法之虚声，沿中土之实弊。”其办洋务三十年而未真见成效的原因，即在于此。他们强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㊳即注重学术和教育，以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材。由此出发，他们看到并强烈抨击了科举制的弊害，要求变通科举、废除八股。《公车上书》主张将八股以“策论”取代，严复更大声呼吁：“然则救亡之道当何如，曰：废除八股而大讲西学，则庶乎其有鸠耳。东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可易也。”㊴

与要求变通科举相一致，他们则大力主张兴办学校，传授各种专门的西方实学。当是之时，他们已经正视到国民素质这一重要问题，并提出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的思想，特别是强调开

民智和实行普及教育。他们指出："小民不学，则农工商贾无才"，而"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㊵自觉把改革学术和教育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学术和教育角度着眼，他们进而把思想批判的触角深入到深层的意识形态、抵及到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同时开始宣扬西方自由平等的意识形态和民主政体的优越性。严复在这方面的言论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他在这一时期的"主战"言论及其相关的文章中，将中西政治、学术文化，风俗习惯等加以比较，显示出"西学"和"西法"的全面优越。他认为西方的政教"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㊶

在宣扬西方政教优越性的同时，严复还直接批评和部分否定了传统的中国政教。他公然声称："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少是而多非。"㊷坦率地表示，"周孔之教固有未尽善焉者，此固断断乎不得辞也"，㊸"苟求自强，则六经且有不可用者"，㊹在当时，这种言论不仅新人耳目，而且惊世骇俗。对于论者来说，则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胆量。而这一点，正得之于他那胸中无法抗拒的爱国激情。

基于此，严复还尖锐地抨击了君主专制。他借"辟韩"，撕下了君主永恒至上的尊严假面，指出君主的存在，正是社会不完善的产物，随着民智民德和民力的提高，它终将成为历史的陈迹。㊺由此出发，他和康有为一样，表达出中国在政治上须实现"君民同体"的愿望。㊻虽然他觉得由于民智太低等原因，中国还不能马上照搬西方"建民主"和"立议院"，但却强调这种政体的优越，并断言中国迟早得实行这些制度，且须从此开始，就为此创造条件。

众所周知，戊戌维新思潮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主张全方位地改革传统和学习西方，不仅在经济，军事等领域，而且在文教乃至政治体制上，都要效法西洋，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从上述对甲午战争后期"主战"舆论所提出的激进变法主张的简述中，可以看到，它们显然已经在开始体现这一本质特征，从而自然地构成了此种思潮的思想前奏和序曲。

此外，此期"主战"舆论还在经济、军事、外交、文教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具体的改革主张，其中很多也都被此后的戊戌维新思潮所直接承续和发展，甚至完全为"百日维新"所采纳。由于篇幅的关系，对此就不再具体论及了。

总而言之，戊戌维新思潮并非突如其来，要了解它的源头，必须把眼光投诸甲午战争后期的"主战"舆论，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其社会心理和维新思想的最初准备。而这一点，以往是揭示不够的。

---

①马乾乐，程渭主编：《舆论学概论》，第 10 页。

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 4 册，第 3 页。

③⑯《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78，第 61 页。

④可参见田保桥洁：《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

⑤⑰《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 59 页；50－51 页。

⑥梁启超的观点，见《李鸿章传》，转见《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 433 页。

⑦⑧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 104 页，131 页。

⑨⑬㉑㉔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 1 册，第 111－113 页；22 页；384 页；140－141 页。

⑩《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3054)，卷 40，第 28 页。

⑪⑫⑱㉙㉜㊱㊲㊴㊶㊷㊸㊹㊺见《严复集》第一册，诗文(上)，第 39 页；40 页；36 页；35－36 页；9 页；40 页；11 页；49 页；53－54 页；14 页；35 页；32－34 页。

（下转第 35 页）

②《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5。
③《日本外交文书》卷27,第2册,第167——168页。
④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史料选译》,第14页。
⑤同上,第27页。
⑥《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5。
⑦《蹇蹇录》中译本,第34页。
⑧《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战争》第2册,第523、524页。
⑨同上,《中日战争》第3册,第72页。
⑩《朱强甫集》,《中日战争》第5册,第509----510页。
⑪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上册,第26页。
⑫《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5。
⑬《中日战争》第4册,第576页。
⑭《翁文恭公日记》第33册,第89页。
⑮《中日战争》第5册,第505页。
⑯所谓翁同和逼李鸿章对日作战是为报私仇,系指李鸿章曾代曾国藩起草参翁兄安徽巡抚翁同书的奏折,据有的研究者考证,并无其事。

(上接第111页)
⑭⑮《盛宣怀档·甲午中日战争》(下),第137页;142页。
⑲㉒㉖㉗㉝㉞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第272页;282页;175页;222页及168页;213页;316页。
⑳㉓续编《中日战争》,第2册,第576--577页;351页。
㉕鲁阳生编:《普天忠愤集》卷7,第9—12页。
㉘㉚㉛㉟㊳㊵㊻皆引自,或可参见《公车上书》一文,《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修订本),第38—51页。

[作者附:本文在选题和一些观点上受到李文海教授的指点,他还惠给所积累的有关资料,在此谨致谢忱]